

由自由性理

文化思想批評論文集

著 胡 鏞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PDG

序 言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把在抗日戰爭期間，由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間所寫的十幾篇文化思想批評文字印爲「理性與自由」一個集子。現在看起來，雖然事過境遷，其中所提到的有幾位先生的思想現在也已和當時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這些文字中所接觸到的一些問題也還有可供參考的價值，所以刪去了其中的若干篇，重印一次。這些文字一方面因爲都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嚴格的檢查制度之下寫的，不免有行文曖昧和故作迂迴之處，另一方面限於作者當時學力，也有現在看起來說得不够清楚透澈的地方，但因爲是舊書重印，所以除了個別的字句外，未作更多的修改。

一九五〇年九月

目 次

序 言

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一)

一個唯心論者的文化觀.....

這就算是批評麼？.....

是聖人還是騙子.....

* * *

評錢穆著「文化與教育」.....

論歷史研究和現實問題的關聯.....

論『誠』.....

* * *

評馮友蘭著「新世訓」.....

評馮友蘭著「新專論」.....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

一

譚平山先生最近在一個雜誌中發表了一篇「紀念國父中山先生誕日並敬告青年」的論文，在這裏面，他向青年提出了幾點「最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必須有遠大的理想」，「第二，要有實際的精神」，「第三，不盲從，不迷信，反對獨斷」，……他說：「在中國社會中，有種種的束縛，阻礙着青年思想的前進，不容青年懷有遠大的理想。一方面是保守的封建勢力以固陋的成見，獨斷的教條強迫青年接受，要青年照着老樣子去生活，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處之若素，不許懷疑，對權威者的一言一勸，盲目的信從，而不許問：為什麼？青年要有遠大的理想，開闊的胸襟，必須打破這種束縛……」

破除盲從與迷信，推翻獨斷的教條，從現實中確立遠大的理想，在實際中作實事求是的努力，這是代表着一種什麼精神？是清醒的，現實的理性主義的精神。

我們的抗戰是正義對非正義的鬥爭，是人類的理性對反理性的鬥爭。因此，在我們的抗戰中所發展起來的思想文化潮流，其基本的方向，應該是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要求科學，因為科學的精神是實事求是，這是迷信的對立物；理性主義要求思想的自由，因為自由才能保證思想的活潑發展，這是治療獨斷的聖藥；理性主義要求合理的思考，而所謂合理就是要求邏輯與現實的一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一切愚昧的盲從從根基上剷除淨盡！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思想在其發展向上的時期，都是理性主義的，而當它表現反理性主義的傾向的轉化時，也就表現出了它的沒落崩潰。「近代歐洲的文化」，——如譚平山先生所說，「是在反對了中世紀的頑固的教條之後才發達起來的，所以英國近代的第一個大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首先提出要打破偶像與成見的主張。」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歐文化是理性主義的（注意，這里所說的理性主義與說到經驗論與理性論的對立時的理性主義含意有廣狹之不同。）但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着資本主義的向上時期的過去，隨着獨佔的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到來，隨着西方的資產階級已成爲不是助長而是阻止歷史的更新發展的勢力，於是在文化上也崛起了反理性主義的思想，這種反理性主義表現在哲學上就是直覺主義，神祕主義，唾棄客觀的觀察與思考而推崇朦朧的直覺與盲目的意志；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就是對民主政治的懷疑，而以馬基佛里的唯力主義爲聖經；表現在經濟思想上就是庸俗的效用價值說等等。法西斯的思想是反理性主義思潮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近代思想最反動的一個表現。

我們在實踐上以民族自衛的正義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因此我們也要在思想上發揚理性主義來反對反理性主義。也因此，我們就更要嚴密檢查在我們今日的論壇上由於外在內在的某些條件

而形成的某些反理性主義的傾向，加以及時的克服，因為這是有害於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的！

二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的詩人——所謂未來主義的藝術的創始人——馬利納蒂（Marinetti）曾經歌頌戰爭說：「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建立了力與平靜的諧和」；「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使槍聲大炮聲，休止時的沉默，以及腐爛時的芬芳的氣味，都諧和起來了」；「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創造了新的建築術，例如巨大的軍用車輛，飛機飛行時的幾何學以及焚燒著的村莊中的螺旋形的黑煙」；「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使男人的身體更加年輕，女人的身體更加可愛」；等等等。無須解釋，這位「藝術家」正是「法西斯就是戰爭」這格言的最忠實的奉行者，所以他把他的「新美學」建立在戰爭上，而歌頌着尸身腐朽的「芬芳」，和村莊焚燒時的黑煙的「美麗」。

法西斯主義者這樣地歌頌戰爭是不足爲奇的，因為對於他們，除了戰爭，沒有任何出路，沒有任何更遠大的希望。但是假如我們也跟着大聲喧嚷道，目前是「大戰國」的時代，一切都爲了戰爭，除了戰爭，沒有任何別的，那是什麼意思呢？請看這樣的話和法西斯瘋狂的囁語有什麼差別：「眼見歐洲已踏上大一統的門限，將來的世界大戰恐怕是大陸與大陸的戰爭，所趨的最後方向是以武力得來的全世界大一統」；「體魄健全的當政男兒不能不拿起槍來，準備二百年的苦戰，大戰國的時代只允許大戰國的作風，大戰國的作風只有二字——（一）戰！所以和平不可能，和平乃下次戰爭的準備。……」「愚蠢的俗人們，莫以爲宇宙是一和平的機構，莫希冀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只有在我們的武力

統治上才能實現」。（散見「戰國策」各期）（註）這些話若出於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閥口裏是瘋話，而出於我們的教授們的口裏更只是夢話！

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法西斯侵略戰爭恰恰不是美麗的，而是醜惡的；人類的文化的繁榮發展恰恰不是依靠殺戮與破壞，而是依靠自由與和平？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我們的抗戰恰恰不是爲了戰爭而是爲了消滅侵略的戰爭，這才是正義的戰爭，值得歌頌的戰爭？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恰恰就在目前的全世界的戰火彌漫中，已顯露了人類的永久的和平自由幸福的文明的道路？我們中國人民浴血奮鬥正是爲了實現這一道路；我們有這樣偉大的理想，所以我們才能實現這眼前的鬥爭。

三

法西斯主義者高擡尼采，我們的學者也高擡尼采。尼采說：「愛和平吧，因爲和平是對於新的戰爭的準備，短時期的和平是比長時期的和平更可愛的。我勸告你們，不要工作，而要戰爭」。所以戰國策論客也說：「和平乃下次戰爭的準備」，而把戰爭當做時代精神的「母題」。尼采說：「奴隸性是構成文化的主要的必須條件之一」，所以戰國策論客也主張民衆應該像奴隸一樣地崇拜英雄。尼采說：「男人底教育是爲了戰爭，女人底教育是爲了給戰士安慰」，所以戰國策論客也要在「大戰國時代」（註）「戰國策」是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在昆明出版的一種刊物，這裏面的撰稿人，如陳銓，林同濟等，當時被稱爲「戰國策派」，以後在納粹德國逐漸顯露出敗象的時候，這個刊物也停刊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

高唱新賢妻良母主義。……

然而西方的法西斯主義者還不只是以尼采爲滿足，更想和黑格爾攀親。黑格爾——這一個偉大的辯證論者，因爲受了他的觀念論外衣的束縛，在其思想體系中，特別法律哲學的一部分表現出了反理性主義傾向。因此黑格爾一死，他的繼承者就循着兩條道路發展：一方面，人們接受了他的辯證思想，發現其合理的核心，把它的整個體系加以一次顛倒，使之成爲現實的鬥爭武器；另一方面，人們發揚了他的反理性主義的思想要素，用直覺主義來解釋他的辯證法，閹割了其中革命的要素，使之成爲神祕的東西。所謂新黑格爾學派正是做着後一方面的工作。西歐的在沒落中的市民層就利用了黑格爾的顯赫的名字，而用新黑格爾主義的精神來對抗對於黑格爾思想的革命的改造與發展，這種辦法在我們這裏居然也發生了反響。

賀麟教授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就特別引證了德國克洛那（Knöner）教授的話：「黑格爾是最大的非理性主義者或超理性主義者，也可以說黑格爾是理性的神祕主義者」；且加以詮釋說：「此語頗博得現代許多黑格爾學專家的贊許，蓋最近的趨勢皆欲糾正前此認黑格爾爲純理性主義者或泛邏輯主義者的偏誤也」。接着他又引證哈特曼（Hartmann）教授的話說：「……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我們也不能否認辯證法中有曖昧不明處，神祕莫測處。此顯係出於天才，雖可修養，但難於模仿。它實是一種特有的原始的內心洞觀，而且是一種高遠的洞觀……。」於是賀麟教授也跟着說：「黑格爾自己承認這是一種洞觀，是一種有神祕意味的思辯的真理。但是所謂神祕的非是反理性的，不過此種由物的正面究極到其反面，由物之對立而洞觀其統一的直觀，非一般形式的分別的理智作用所可了解罷了」。儘管他聲明並非反理性的，但用「直覺」與「洞觀」來解釋黑格爾，豈不正是把黑格爾思想

反理性主義化了麼？（賀麟教授文見時代精神三卷一期）

不能否認的，黑格爾的著作中有許多神祕主義的色彩，但這並不是他的思想光芒之所在，而恰恰是掩蔽其光芒的黑幕。現在，所謂「黑格爾復興運動」卻並不在於去真正發揚黑格爾的思想光芒，而是企圖把這神祕主義的霧罩得更濃，想使辯證法永藏在這霧中，以消滅牠的革命性，因此，這也就是企圖以黑格爾的反理性主義的發展來虐殺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的發展。西歐在沒落中的資產者早已做過這樣的 effort 了，但並沒有得到什麼足資誇耀的成績，中國的學者揀拾其唾餘，有什麼光榮呢？

四

「戰國」派的林同濟教授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洋洋大文，叫做：「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據他在這篇文章中分析，從五四以來，現代中國學術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民八到十八年，「可叫做經驗實事時代」，以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大綱」為開山之作，第二階段是從民十八年以後，是「辯證革命階段」，以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出版發其端。而現在，是要準備踏進一個新的階段了。關於林先生對過去中國學術思潮的階段劃分與其認識，實在很有問題，這且不去說它，只看在他心目中所要展開的新階段到底是怎樣的呢？於是我們就劈面遇着一大套的玄妙的論證：「乃是一種嶄新的作法，迫近一種鳥瞰的姿勢，代表航空時代的一種作風，有如列賓乘飛機而行，兩萬尺下，山川陵谷，高低斜平，歷歷在眼底，呈湧出一幅渾成圖畫，自有它的『母題』Motte，它的整個骨相的」。真是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所以林先生也說：「我無以名之，欲名之曰文化綜合

Cultural-synthetic 或文化攝相 Cultural Configurative 時代」。讀者恐怕簡直就不知這是在說些什麼，請略加以詮釋。

原來當今之世，戰爭有所謂「全體性戰爭」，國家有所謂「全能國家」，於是見獵心喜，文化也不妨來個「全體性的文化」或「文化的全體觀」了。這是其立意的由來。但怎樣把握這「全體」呢？本來對一個民族文化不要作片面的局部的觀察，而要認識其總體與全面，是不錯的。辯證唯物論者從來沒有企圖以局部的把握代替全面的認識，而正是要通過分析把握豐富事實而加以系統的綜合。但林先生認為這樣不行，他要高高出於眾多的事實之上，而用慧眼的一瞥來洞澈於上下古今。這確是相當神祕而難以言傳的，所以林先生不得不借助於種種譬喻來說明他的見解，甚至借助城隍廟中看相先生來打比。原來他所謂「攝相」的「相」即「看相」的「相」也。據說，看相的，雖也看你的面貌骨骼，但他還要看出超乎面貌骨骼以上的神氣，怎樣才能看出這個呢？——那就不能不借助於賀麟教授所說的「高遠的洞觀」，「神祕的直觀」了。林同濟教授自己也說，要認識整體「不是加減乘除問題，乃是窮機神會問題」，因此才要「航空」，而且越高越好！因此才要脫離了分析而談綜合，脫離了事實而談玄妙的「體相」！

林同濟教授有幾句話說得還有點道理。「第一期的功績在掃蕩千餘年道學面孔的淫威，捧出冷酷的事實來打碎那麟甲千秋的載道設教的老偶像。細驗此中，乃含有一股純理智的精神」。是的，五四初期的學術思潮是貫澈着理性主義的精神的，那就表現為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而林同濟先生所謂第二期的學術思潮也依然是理性主義的。現在林先生想對第一二期來一個反動，那正是想以反理性主義來反抗理性主義。

然而在西方支持着反理性主義思潮的政治勢力已在這世界大變動中日趨於沒落的時候，人們却在東方爲之搖旗吶喊，亦多見其不學無術而已。

五

正因爲我們抗戰不只是爲了戰，更是爲了建國，而在建國工作中，學術文化的建設是最重要的部門之一，所以最近，似乎許多方面都在注意着今日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動向的問題，上舉林同濟先生的話正是其中之一。這問題確是一個遠大宏闊的問題，但是倘明確的把握着整個世界的政治理想的動向和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向，這問題也不難得到結論。而也正因爲目前整個世界處於最複雜的變化之中，一眼看去，似乎一切都在未定之天，這就閼昏了許多人的頭腦，在各種問題上做出了荒謬的結論。在這裏，我們不打算詳細討論世界與中國的發展動向，但我們可以斷言的是：以世界範圍來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勃發起來而每况愈下的西歐反理性主義思潮已經絕對地沒有出路了，正如它們的支持者在政治上的沒有出路一樣；而在中國，既然從五四以後，在搬運西方的學術來之際，早曾零零碎碎地帶進了許多反理性主義的出品，卻並不能在國內起多大的作用，那末，在今日，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正在使全國人民的覺醒與力量飛速提高的時候，更難給反理性主義的學術思潮以任何發展的餘地了。

整個人類將從戰爭的烽煙中獲得理性的充分解放與發揚，中國的學術文化的發展路向也終歸不能不是理性主義的。

這是一條坦蕩的大路，洋溢的長流。然而在大路上有障礙，在長流中有逆流，這種反理性主義的思想潮流在今日個別地出現是深可注意的事。而其發生的原因也是不難解釋的吧！

逆流是不能永在的。但正因為逆流的存在，我們就更不得不堅持主流的發展。

我們要堅持科學的精神，堅持思想的自由發展，堅持合理的思考，從這裏面培植我們的遠大的理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反對一切盲從和獨斷，打碎一切反理性主義！我們一面要排斥因襲的傳統的成見，一面要排斥西方腐敗思想的傳染，而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發展中充分發揚清醒的現實的、科學的理性主義。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一個唯心論者的文化觀

——評賀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論簡釋」

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批評一個公開的唯心論者，倘從基本點上來爭論，那麼我們不能再提起在這哲學上的兩大營壘之間已經不知道爭論過多少次的許多問題，但在這個書評中却不打算這樣做。我們所要評論的這本書，從其題目看，雖然像是本系統地解釋唯心論哲學的書，但實際上却是一本論文集。之所以引起我們興趣的地方是在於它的作者所企圖進行的「文化批評」的工作。作者說：「批評文化可以說是思想界最親切，最有興趣，對於個人和社會，對於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最有實際影響和效果的工作，因為文化批評一方面要指導實際生活，一方面又要多少根據一些哲學理論。所以文化批評乃是使哲學與人生接近的一道橋梁」。（頁二五七）我們在這裏要討論的也就是：這書的作者從他的唯心論的觀點與立場出發，在文化批評上到底進行了怎樣的工作。

事實上，和本書同樣觀點與立場，並企圖進行同樣工作的著作目前也還不少，我們之所以獨選擇這一本者，是因為第一，本書作者非常正確地把自己歸於唯心論陣營中，不像有些扭扭捏捏裝做什麼物心綜合論者那樣叫人作囁，其次則因為本書在同類著作中是算得比較有見解的，比較的能成一系統的。

現在我們就來討論賀自昭先生——這一個唯心論者的文化觀，但我們還不得不先說明一下他到底

是怎樣的一個唯心論者——

直覺論的神祕主義

在本書中，有一篇附錄，是德國 Heinrich Meier 的分析近五十年來西洋哲學的論文，其中說得好，「由注重直覺而陷於無理性，由理性的絕對主義，而走到無理性主義，此實現時哲學界最顯著的事」。（頁三四九）雖然這位德國教授對於這種反理性思潮的分析是非常不完備的，但他正確地指出了直覺論與神秘主義和反理性主義之連接，認為這是「對於真理之反叛」，並且他指出這種傾向是肇端於十九世紀末年，而「自歐洲大戰後愈益流行」。在我們看來，這種思潮正是大資產階級腐敗沒落的表現，當然是代表不了這五十年的整個哲學界的。站在古典唯心論立場的這位德國教授却不能不對唯心論的這種沒落痛心疾首，認為「自此種哲學流行以來，哲學界顯然弄成一種可怕的無批判無指針的狀況。」

奇怪的是中國的賀麟教授在翻譯了這一篇德國教授的論文後，並不能斷然否認直覺的反理性的意義，却又自白道：「我個人對於此問題也異常徘徊遲疑，但經過很久的考慮，我現時的意思仍以為直覺是一種經驗，復是一種方法」。（頁九二）終於說：「我們謂直覺方法與抽象的理智方法不同則可，謂直覺方法為無理性或反理性則不可」。（頁九四）然則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方法呢？他又用不確定的口氣說：「直覺法恐怕更是基於天才的藝術」。（頁九四）並且直覺又可以是「先理智的」，就是說，在運用理智前，先可以用直覺來慧眼一瞥地得到「對於實在對於理念的整個印象」。（頁九

六）而理智的作用却不過是分析這種印象而已。

唯物論者認為感性的認識是先於理性的認識的，人們透過感覺的認識才能對於外物實行理智的思考。多數的唯心論者則相反，把理智置於感覺之前。但沒有從感覺中所得到的實在的經驗做基礎，所謂理智豈不是完全落空了麼？於是當唯心論發展到其最後階段，就索性把理智也推翻了，在理智之前，更設一所謂「直覺」的階段，而這直覺是「天才」的「藝術」，平常人所無法企及的。這樣他們就更遠地離開實在的知識，而更深地進入神祕的境界了。

所以，賀麟先生雖自認爲紹述康德與黑格爾，但實際上却是那些把整個康德黑格爾學說神祕化，反理性化的新黑格爾學派——德國的Kroner，意大利的Croce之流的同輩弟兄。這些侮辱了那位偉大的辯證法哲人的名字的德意學者，現在已經成爲法西斯主義思想上的保護人，而我們的賀麟教授也跟隨着把黑格爾學說和辯證法神秘化起來。他對辯證法的描寫是「辯證法一方面是一種方法，一方面又不是方法，是一種直觀」，「這需要天才的慧眼」，「理智的直觀每爲大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政治家、宗教家所同具，且每於無意中得之」，「無論獲得辯證觀也好，運用辯證觀也好，都需要藝術式的創造天才」。（均見本書「辯證法與辯證觀」一文中。）

很顯然的，假如這樣的「直觀」，這樣解釋的辯證法，是成爲方法的話，這種方法就只是神祕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不能引我們到真理，而只能引我們到混沌。

想用這樣解釋的辯證法當做武器來攻打唯物論的辯證法，那不過是想以一個無處着落的黑影子來對敵輝煌的陽光罷了。

但要以慧眼的洞觀，天才的直覺來在瞬息之間，了悟過去與當代的文化，這怎樣能辦得到呢？唯物論者從實際歷史發展中討論過去的人類文化是經過怎樣的歷程，以後又將是怎樣發展下去，但這種討論，在賀先生看來是「形而下的」，與哲學無關。哲學却是要「單就理論上先天地去考察」社會文化所「應取的步驟或階段」。（頁二三二）這就是說：可以不顧過去歷史「是」怎樣；而專從理論上來討論它「應該是」怎樣；因而也就是不從現實的發展趨勢來推究以後將「是」怎樣，而只是從理論上推斷其「應該是」怎樣。這所謂理論是先天的，先經驗的，先理智的。——這是何等奇怪的理論啊！對於主張這種理論的人，我們只好說：你願意白晝做夢，你就去白晝做夢吧。你不管真理，真理也不會來理你！

但一種理論既和事實無關，到底有什麼用處呢？與社會進化的事實無關的社會進化的邏輯，對於文化能起什麼批評作用呢？——賀先生回答道：理論（先天的邏輯）與事實，雖不相關，但却能往往相符合。為什麼呢？他又告訴我們，這是因為理論本身既是合法則的，則雖是先於經驗，經驗的事實却不會違背它。這實在是很奇怪的。依照此說，則我們可以完全不知道歷史，光憑空洞的邏輯，就能設想出社會進化的歷程，而歷史事實却剛好和這設想相符。這是無論如何也令人難以想像的。於是賀先生又補充說，事實之所以符合理論，原來是因為「事實本來是經理論邏輯，先天範疇加以組織整理而成」。（頁二四九）我們先有對於社會發展的幻想的公式（對不起，我們只好稱這是幻想的公

式），然後根據這公式去整理事實，於是結果，事實就符合了理論。這固然是明白易曉的事，但如此做法，我們對於事實了解了些什麼呢？我們對於社會的發展了解了些什麼呢？那不過是任意改造事實來牽就理論罷了。

目前流行的對唯物史觀的「批評」是說，唯物史觀只依照主觀的公式來安排歷史材料。但這批評，如上所述，恰恰倒正是這些唯心論者為自己的寫照。本來，一切唯心論者——特別是進入其腐敗時期的直覺論者，無例外的，是絕端的主觀主義者。他們假設了「先天的範疇」而把歷史硬裝進去。

既然是依照「先天的邏輯」來純主觀地批評社會文化，當然他們就可以十分自由地，不顧古今中外的不同（用賀麟先生的話，就是「超時空」地）任意搬弄一切文化歷史的現象。像在這本論文集中就把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人本主義和中國古代儒家之注重人倫混為一談。（頁二七五）具體的文化歷史條件，和由而產生的，在彷彿相似的面貌下的相反本質是完全被棄置不論的。這樣一來，一切發展進步也就毫無意義了。所以賀麟先生說：「從舊的裏面去發現新的，這就叫作推陳出新。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歷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頁二七四）固然我們也從不以為，新的事物是與舊的事物完全無關，突然跳出來的，但這並不是說，「從舊的裏面去發現新的」，（這是承認新早已存在在舊裡面）而是從舊的里面發展出新的：舊經過發展，變革而成為新的。

市面上現在流行着許多新字號的產品——新理學，新世訓，新人生觀，其所謂新，就正是如賀麟先生所解釋的。在基本上，他們都是用超歷史的範疇來抹煞新舊的差別，把舊貨改裝一下，當做新貨來出賣。